

〔日〕内藤湖南 长泽规矩也 等著

日本学人 中国访书记



钱婉约 宋炎 辑译

中华书局

〔日〕内藤湖南 长泽规矩也 等著

日本学人 中国访书记

钱婉约 宋炎 辑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4904-4

I. 日… II. ①内…②钱…③宋… III. ①图书史—中国
②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③文化交流—文化史
—中国、日本 IV. ①G256.1②B25③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765 号

-
- | | |
|------|---|
| 书 名 |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 |
| 著 者 | 内藤湖南 长泽规矩也 等 |
| 辑 译 | 钱婉约 宋 炎 |
| 责任编辑 | 马 燕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数 194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904-4/K·2124 |
| 定 价 | 32.00 元 |
-

绪 论

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

钱婉约

白首名场甘伏雌，抱残守缺慕经师，
收来天壤间孤本，宋刊珍篇单疏诗。

千古师儒费句梳，说文解字许君书，
购将宋刊兼唐写，高揭楣匾汉学居。

零残盲史王朝写，前辈收储手泽存，
细校尤宜博多版，古香绕笔烂殊痕。

奇篇只合属吾曹，岂许老伦论价高，
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

以上是内藤湖南书赠田中庆太郎的《恭仁山庄四宝诗》。恭仁山庄是内藤晚年隐居耕读藏书处，四首七绝诗分别记述了他三万余册古籍善本藏书书中最为珍稀的四种宝籍：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唐写本《说文解字》木

部残卷、日本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及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今天，我们吟咏这些诗篇，那种淡泊功名、忘情书卷的书生情怀，那种坐拥千古孤本、堪抵南面君王的自得其乐之情，似乎仍然溢于诗外，扑面而来。以上所咏及的四种珍本，都被日本文部省确认为“日本国宝”级重要文物。其中除了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外，其他三种均为在中国亦堪称稀世珍宝的中国古籍善本。

晚清、民国年间，是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开始踏上中国的土地，寻求发展的机会，考察中国社会，并点滴渗入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中国赴日留学的热潮兴起，也加强和推动了中日文化的双向交流。以这样的时代局势、文化变迁为背景，日本对于中国汉籍的关注和搜求，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近代日本人来华访书，在学术上，又是以日本中国学的建立为背景和原动力的。中国学作为近代文化学术中的新生一支，与传统汉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他们把中国当作一个客体，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十分注重对于研究对象的实地踏查：包括通过修学旅行感受中国；派留学生到中国进行语言和专业的进修；以及专家的文献调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还包括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等。这种

本质性的转变，滥觞于明治维新以后欧化风潮的 80 年代，实现于甲午战争以后的 90 年代中后期。这与来华访书的展开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访书活动，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了解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所在，同时展示中国学发展的实际态势，及其与中国学术界、与中国文献典籍、与中国书业界的相互关系。

以下对本书涉及到的学者、文献学家及其来华访书购书的基本情形向读者作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对近代日本人来华访书作一些综合性的分析、思考。

一

内藤湖南（1866 - 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之一。他的前半生为记者，是明治中晚期日本新闻舆论界有名的“中国通”评论家。1907 年，内藤湖南转任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成为京大支那学的学术带头人，与狩野直喜等人一起创建了此后名闻遐迩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他一生曾先后九次来中国进行社会考察、学术访问等，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等有过许多接触和交往，而访书更是其主要目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1910 年的北京敦

煌文献调查和1912年的沈阳故宫满蒙文文献的拍摄。

日本最早获知中国发现敦煌文物是在1909年秋。次年，清政府决定把敦煌劫余文献由专员押运抵京，归学部管理，移存京师图书馆。内藤湖南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京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富冈谦藏讲师、滨田耕作讲师等5人，于当年8月下旬赴北京，盘桓五十余日，调查敦煌遗书以及内阁大库文书等。在此之前，内藤与京大的其他一些教授们，已通过敦煌经卷照片，开展对敦煌文书、敦煌艺术的介绍和研究。他们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来狩猎敦煌文献的，但是，这些劫余文献在运往北京途中，由于又遭中国大小官员人等的盗窃，损毁程度相当严重。所以，内藤一行所见到的，只是一些佛教经卷，大多数就是世间通行的《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般若经》等，但内藤他们也发现了如《相好经》、《首罗比尼经》、《佛说呪魅经》、《般若第分中略集义》、《浮名经关中疏》、《报冥传》等等罕见经文。

1911年2月11、12两日，在京都帝国大学第九教室举办了“清国派遣员报告展览会”，向社会开展览派遣团5人带回的文物典籍，同时举行演讲报告，给每一位来参观、听讲的与会者发放《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报告展览会目录》的小册子。《大阪朝日新闻》还用两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演讲记录。可见当时学术界的重视程度和引起的社会关注。可以说，这次访书对日本刚刚兴起的敦煌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内阁大库的文书，在当时尚是清王朝宫廷档案的一部

分，还包括前朝遗存下来的宋、元、明档案，应该是秘藏，而不属于公开流通的图书文献。我们并不知道作为外国学者的内藤他们，是怎样获得清廷官员的许可，进入内阁观书、探得虚实的。但通过内藤一行的考察报告可以知道，当时内阁的古书处于毫无整理的状态：“我们去的情形是：把允许我们一行阅览的部分，连箱子一起搬出，向我们打开，这时，包括给我们看的人和我们这些要看的人，都不知道将打开的箱子里面是什么内容。”他们对其中的宋元版珍贵图书典籍，备感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康熙朝由传教士绘制的中国舆图格外感兴趣，并“对兴安岭地区、喀尔喀地区、哈密地区三幅分图，拍照带了回来”。这与近代日本关注中国边疆史地是有关系的。

五人教授团分别属于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分科，因此，1910年的北京之行，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学术调查和书籍搜购。如为研究北京城自古以来的沿革，踏查了不少京郊古碑，拓作了古石碑的拓本；又如对于甲骨片、钱范、古印、铜镜、封泥等古文物的关注、收集；还悉心搜购以往一向不为正统文人学者关注的小说戏曲类文献。此外，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小川和考古学家的滨田，还去了洛阳龙门，去了满洲，考察那里的地质地貌、历史遗址、文物遗迹等。

猎取沈阳故宫的满蒙文档案文书，是内藤一生访书收书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满蒙史研究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沈阳即当时的奉天，1912年内藤湖南写下《奉天访书谈》专记此事。实际上，1912年与其说是“访书”，不如说是已经对准了目标，专程前来“拍摄”、

“猎取”的。因为在此前的十年中，内藤已于1902、1905、1906年多次赴满洲调查、访书，了解了沈阳故宫里各个楼阁内的收藏情况，并进行了部分拍摄和购买。这里，先简要补述前几次的活动。

1902年在奉天喇嘛教寺庙黄寺中，内藤发现了他自称是“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满文大藏经》，以及其他满洲史料。但此时内藤尚不懂满文、蒙文，把《蒙文大藏经》误识为《满文大藏经》。事实上，此时的日本，几乎无人懂得满、蒙文。但此次黄寺所见，使他深感满、蒙语知识的重要，即在北京购买了有关满、蒙文的书籍，归而自学。这成了他研究满洲史的发端。

1905年，当他再次来到奉天时，对满语、蒙语已有基本掌握，这使得他此行能在文献上获得重大发现：在崇谟阁发现了《满文老档》、《满蒙汉三体满洲实录》（又名《太祖实录战图》）、《满蒙汉三体蒙古源流》、《五体清文鉴》、《汉文旧档》等有关满洲史的重要史籍。内藤当即将《汉文旧档》全部晒蓝图制版而归，又拍摄了《蒙古源流》的蒙文部分。此外，在日本军方出面下，强行压价买下了黄寺收藏的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包括此行于北塔（奉天城北郊法轮寺）新发现的《满文大藏经》，一起带回日本，这两部满、蒙文藏经，藏于东京大学，后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

1906年，内藤受外务省委托调查间岛问题，利用公务之便，内藤再次访黄寺，入崇谟阁、文溯阁，抄录并拍摄了《满文蒙古源流》、《西域同文志》、《旧清语》、《满文长白

山图》、《盛京全图》等。其中，《蒙古源流》的借阅与拍摄，曾遭到崇谟阁看守人的拒绝和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反对。内藤声称《蒙古源流》是调查间岛问题的关键资料，让当时的外相直接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又由总领事以外交手段贿赂赵尔巽，才得以达到目的。

对内藤来说，奉天访书的最重大收获是在1912年。这次他是受京都大学委托专程赴奉天，拍摄故宫宫殿内珍藏的清朝史料的。从3月23日到5月17日，整整八个星期，他埋首在崇谟阁内进行紧张的拍摄工作，在京大文学部讲师富冈谦藏、羽田亨的协助下，如愿以偿地拍下了《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鉴》，而计划中的另一本文献《太祖实录战图》未能拍成。《满文老档》是研究满洲开发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可以说，内藤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最早注意到《满文老档》史料价值的学者。它被拍摄带回日本后，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另有副本藏于日本满铁调查部“白山黑水”文库，对日本满洲史研究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五体清文鉴》，是清朝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大民族的文字辞书。由康熙敕修，乾隆年间陆续成书。最早是满、汉对照，后加入蒙、藏文，最后加入维吾尔文，完善为《五体清文鉴》。此书只以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及奉天的宫殿中。它既有语言学上的实用价值，又有历史研究上的文献价值。

关于这次拍摄，也颇有一番曲折。奉天宫殿对外国人调查先皇遗物，是采取谨慎态度的。内藤到达后，先是由领事馆与奉天都督赵尔巽交涉，内藤又私人出面，以多年前旧识

的身份，送了赵尔巽和手下的孙外交官厚礼，这样公私夹击，才得以进入宫殿拍摄。他们还谎称只是拍摄文字书籍《清文鉴》，而实际上则是先秘密借出《满文老档》，当全部拍摄完《满文老档》的4300张胶片时，他们立即还掉此书，又借出《五体清文鉴》。在续拍《五体清文鉴》之前，内藤去了一次大连，等两天后回来时，中国方面从总督到交涉使到具体管文书的官吏，都已改变了态度。内藤记道：“这《满文老档》都写了什么，中国的官员们并不清楚，连总督大概也不清楚，只知是用满文写的书籍而已。但日本人却特意进宫拍摄，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默默地改变了主意，不再许我们拍摄。”于是，内藤他们在秘密状态下，以10天时间赶拍完《五体清文鉴》的5300张胶片。而本来打算中的《满洲实录》即《太祖实录战图》，便没拍成。

此行访书，除以上拍摄外，还雇佣中国人，由富冈谦藏主持，在文溯阁选择、抄录了《四库全书》中的一部分珍本。

二

田中庆太郎（1880－1951）是日本中国学界有名的汉籍书店文求堂的老板。他出生于日本京都，祖上就是开书店的，但是供皇家御用的日文书店。日清战争后，他抱着到东京学习中国语的打算，到了东京。1900年，田中庆太郎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毕业，随即就来到义和团运动刚

刚平息不久的中国。这次中国行，促使田中确定了经营中国书书店的志向。次年，京都的文求堂书店移至东京。

田中庆太郎和他的文求堂，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旧文求堂时期，1901年始建到1923年东京大地震。这期间，田中主要往返于北京与东京之间，大量输入中国的古书和字画。文求堂成为东京第一个，也是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的专门书店。

第二阶段：北京时期，上一时期中的1908至1911年。这三四年田中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北京购置了房产，住在那里，一面向当地的文人学者、版本学家等请教汉文化知识，研修汉籍版本，一面全力发掘、购进善本珍籍。因此，有必要把它特别列为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田中通过公开和不公开的方式，购买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经卷、《永乐大典》散本在内的众多珍贵古籍。这些东西及时邮寄回日本，部分直接转卖给熟识的相关专业的学者教授，主要的则通过书店出售。

第三阶段：新文求堂时期，1927至1954年。东京大地震的大火，烧毁了旧文求堂以及它的全部藏书、字画，迫使田中重起炉灶。1927年，新文求堂建成，重新开业，它在外观上，采用了钢筋混凝土防火防震的先进结构，在内容上，也由原来的主要从北京输入古籍珍本，转而改变为主要从上海购入实用的、普及性的新刊本，包括五四以后新式标点的国学基本典籍、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国学研究著作，以及中国语教学用书等。这些书适应于中国学研究的新一代学人，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后生力量准备了及时而充足的资料用书。“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出版业受到重大打击，出书

甚少，文求堂就改为以出版书籍为主，出版了中国语教科书、中国语词典等语言学方面的书籍，以及定期刊物等，共计 200 余种。

1951 年，田中庆太郎去世，文求堂由他的儿子继续惨淡维持了三年，终于在 1954 年全面关闭。

田中庆太郎对于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在日本中国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人们把田中庆太郎、岛田翰、内藤湖南称为最懂中国古籍版本的三位专家。这是他在中国访书购书、回销日本、获得巨额利益的基本保证；也是他为日本中国学界服务、与中国学家交往的资本所在。依靠这一基本功，他为日本搜求买入了不少珍籍善本。在 1928 - 1929 年间，文求堂曾发行《文求堂善本书目》，汇集了当时文求堂收有的约 120 种中国古籍善本的图版及简单说明。文求堂还每年发行一册《文求堂书目》，是书店的售书书目。内藤湖南收藏的如今被法定为“日本国宝”的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 58 卷，便是 1915 年通过田中庆太郎文求堂，用 1500 日元巨资购得的。

在北京时期的田中，对中国古籍的动向十分关注，1909 年夏秋之际，当他得知持有敦煌经卷的伯希和寓留北京时，立刻登门拜访了他，并随后参与了 9 月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首次披露敦煌经卷的展示会，成为日本最早获知并亲眼目睹敦煌经卷的人，并且也成为日本人中第一位介绍及评论有关敦煌文献的人。他以“救堂生”为笔名，于同年 11 月，在北京出版的日本人杂志《燕尘》第 2 卷第 11 号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文章介绍了他与伯希和会

晤及他所见的敦煌经卷的实际情况。

就像琉璃厂书店是民国期间中国学者们的俱乐部一样，文求堂也吸引了东京地区的中国学研究专家，他们经常出入这里，在这里看书、买书、谈书，使这里成了中国学研究的信息交换点。这些人中有市村瓚次郎、和田清、池内宏、加藤繁、白鸟库吉、藤田剑峰、桥本增吉、中山久四郎等教授，还有东洋文库的法人代表石田干之助；当时属于晚一辈的有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仁井田陞等人，也常常在这里得到教益。京都方面的内藤湖南、中尾万三等，凡到东京，也都不忘到文求堂一趟。

到日本游历考察的清朝或民国的学者，也常常被迎接或介绍到这里，如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等一流的版本学家，都到过文求堂，与田中熟识。文求堂大门口的匾额就是傅增湘手书赠送的。此外，郭沫若、鲁迅、郁达夫、傅抱石等人，或是留学日本期间，或是流亡日本期间，也常常出入文求堂，与文求堂及田中家人结下了友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与文求堂，1928年2月到1937年7月间，郭沫若流亡日本，住在东京附近的市川市，这十年间，郭沫若成为文求堂书店的常客。1932年起，文求堂还陆续出版了他在日本期间重要的研究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十部著作。

文求堂的另一位独特的友人是荷兰外交官高罗佩（1910 - 1967, Robert Van Gulik）。高罗佩精通中国语，是写过多部中国学研究著作的东洋学专家，对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书籍的爱好和博识，构筑了两人交往的基础。以至在田

中去世 15 年后的 1966 年，时任驻日大使的高罗佩，还深情地怀念文求堂主人，倡议在田中庆太郎逝世十七周年时，为他编辑出版纪念文集。

从文求堂的兴衰命运可以管窥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近代对于汉籍需求的转变。我们将这种转变大致概括为三个阶段：一、在甲午战争前，汉籍属文化修养类书籍，只是作为书店经营的一部分，在一般的古旧书店里出售，内容以趣味性的文化艺术类为主，如印谱笔墨、书画古董以及作汉诗的辅助性书籍——《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以满足传统社会里一般文人的需求；二、甲午战争后到大正末年，随着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普遍关注和研究风气的兴起，对汉籍的需求转移到学术书籍上来，尤以地方志、老庄周易类、说文类、佛学类书籍，受到学术界的欢迎；20 世纪初，甲骨文、敦煌经卷的发现，开启了学术新视野，甲骨文片、敦煌经卷备受学术界瞩目和搜求，成为有能力的个人及文化机构热衷求购的对象；三、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以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日本对汉籍的需求也从古籍转移到所谓新汉籍上，即新式标点石印本的国学基本典籍类图书，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类图书，还有汉语学习的教科书、辞书等语言学类图书。

三

武内义雄（1886 - 1966），字谊卿，号述庵。他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界中继承乾嘉考据学，埋首于训诂考据，带有较

重“夫子学究”式传统色彩的学者；而从他的学术成果来看，他又是一位具有近代学术理路，最早将中国经学研究转换成思想史研究的开创性学者。武内 1910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支那哲学史学科，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高足。1923 年起长期任职于东北大学，为法学文学部教授，兼任该部部长及学校图书馆馆长。他的主要著作有《老子原始》（1926 年）、《老子与庄子》（1930 年）、《论语的研究》（1939 年）、《中国思想史》（1936 年）等。

1919 年 4 月至 1920 年 9 月，受财团法人怀德堂的资助，武内赴中国北京留学进修，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走访官私图书馆、藏书处，埋首于浩瀚典籍之中，调查、了解中国古典研究最基本典籍的印行、收藏、研究情况。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在他后来整理出版的《燕京读书记》中。从书中看到：他屡次访查京师图书馆，介绍这里所收藏的《四库全书》文津阁本的编纂过程，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为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海津梁”。在私家藏书方面，他着重介绍了徐乾学的“传是楼”藏书，及徐氏指导编纂的《通志堂经解》的刊刻及补遗工作；介绍了阮元的“梦蝶园”以及他刊印《十三经注疏》及《皇清经解》的学术功绩。书中还分专题评述了清朝汉学与宋学的成就得失。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清朝学术史”所示，这是一本以访书、读书、评书为表述方式的学术史著作。

中国古代有成就的学者不仅“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结束留学回国前，武内离开北京，赴江南、华北游历，而其主要目的也仍在于“读书”，只不过是“读地上的

书”。在江南，他对南京情有独钟，参观了鸡鸣寺、秦淮河上的夫子庙和贡院、明孝陵和灵谷寺，以及其他“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遗迹及道观朝天宫等名胜古迹，并作《江南汲古》记之。在华北，武内有目的地寻访了《老子》的古碑石刻。1920年4月与冈崎文夫同赴易州（今河北易县），寻访道教遗迹龙兴观所存三座《道德经》唐碑。如此古老而珍贵的唐代石刻，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其本身亦已成为应该受到妥善保护的文物，但是，武内看到的情景是：

龙兴观在县署南边城墙附近，虽然也算城内，周围却没有人家。穿过田间小路向龙兴观走去，便看到两处屋宇，簇拥在几株古柏中，一前一后，朝南而建。殿堂屋顶已经塌落半边，尊像暴露在风雨中，四周土垣也已坍塌，看似无人居住。前庭已成耕田，隔着通道，右侧立有三块碑，左侧立有一块碑，另有一块碑基。左侧面东而立的是景龙二年（708）的道德经碑，右侧中央面西而立的是景福二年（893）的道德经碑。龙兴观门前另设有碑亭，蔽护着一柱八角经幢，即是唐开元注道德经幢。

我沉醉于古碑中，流连忘返，丝毫不觉时间的流逝，待我与做拓本的人谈妥想要回去时，蓦然发现，日已西沉。

同年六月，武内又与大阪府立图书馆馆长今井恕卿一